

從新制度主義看墨西哥憲政體制 對其政黨政治的影響

蘇彥斌

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摘要

本文從新制度論的角度出發，分析墨西哥的憲政體制如何影響該國的政黨政治發展。具體而言，本文認為墨西哥憲政體制中的「總統集權」與「民選官員不得連選連任」兩大特徵，對於該國政黨體系結構的發展、立法過程以及府會關係，具有重要的影響力。在 2000 年政黨輪替之前，這兩個憲政特徵的加乘效果強化了由革命建制黨（PRI）所主導的黨國體制。然而，從 2000 年開始，這兩個憲政規定加劇了行政—立法衝突，對於政治代表的品質與政治課責造成若干負面影響。

關鍵詞：墨西哥、憲政體制、政黨政治

壹、前言

墨西哥人口約一億兩千三百萬人，在拉丁美洲僅次於巴西；同時，墨西哥與美國接壤，其戰略重要性不言而喻。墨西哥從 1929 年開始歷經了逾七十年、由革命建制黨 (Institu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 PRI) 所主導的黨國體制¹，但自 1990 年代末期以來，其政黨政治發生了大幅度的變化。1997 年 PRI 首次未能在國會拿下過半席次，墨西哥的政黨體系自此維持多黨體系的態勢；2000 年國家行動黨 (National Action Party, PAN) 贏得總統大選，墨西哥出現首次政黨輪替。2006 年 PAN 蟬聯執政權，但其政治支持也因為選舉爭議而大受影響。2009 年的國會選舉，PRI 的席次翻倍，不久後趁勢於 2012 年重返執政，墨西哥完成民主鞏固的二次政黨輪替試驗 (two-turnover test) (Huntington, 1991)。

墨西哥的政黨政治為何在近二十年間發生如此重大的變化？過去文獻有些主張菁英的重要性 (Centeno, 1999; Cheng, 2008)，有些認為社會運動的推力扮演重要的角色 (Chand, 2001; Trevizo, 2011)，有些則從選舉制度與政黨策略的角度進行解釋 (Domínguez, 1999; Eisenstadt, 2004)。上述這些文獻的主張固然各有其解釋力，但與上述文獻不同的是，本文為了集中焦點，以理性選擇制度論 (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 與歷史制度論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兩種新制度主義 (new institutionalism) 作為基礎，從憲政體制的角度，對於墨西哥在民主化前後的政黨政治發展進行分析與探討。

具體而言，本文主張墨西哥憲政體制中的「總統集權」以及「民選官員不得連任」的兩大規定，在民主化前扮演了鞏固一黨專政的體制，而在

¹ 雖然 PRI 統治下的墨西哥並不完全符合 Giovanni Sartori (1976: 42-47) 所定義的黨國體制 (party-state system)，但仍有不少學者將 PRI 統治下的墨西哥描述成黨國體制 (Centeno, 1999; Eisenstadt, 2004; Schatz, 2000)，而且也有學者將中國國民黨的黨國體制與墨西哥的 PRI 黨國體制作類比 (Smith, 2009: 132)。根據 Miguel Angel Centeno (1999: 7-8) 的研究，PRI 黨國體制有如下特色：一、總統集權且依規定不得連任；二、國家官僚體制與軍隊和 PRI 黨組織緊密結合；三、PRI 成功繼承墨西哥大革命的遺緒並據以維繫其統治正當性。

民主化之後，卻造成了劇烈的行政—立法衝突，影響政治代表的運作和品質。本文首先將討論墨西哥憲政體制的特徵，其次則介紹墨西哥的主要政黨，接著將探討墨西哥憲政體制在民主化前後對於政黨體系發展的影響，最後，結論將總結本研究的主要發現，並兼論本文對於理解台灣政黨政治所帶來的啟示。

貳、墨西哥憲政體制的重要特徵與新制度主義的分析觀點

根據 Daniel J. Elazar (1990: 11) 的研究，憲法有三個相互影響的面向，分別是政府架構 (frame of government)、社會經濟權力的分佈 (socio-economic power map)，以及政體的精神基礎 (moral basis of polity)。具體而言，政府架構的面向包含了政府體制、政黨、選舉制度等，而社會經濟權力的分佈則反映憲法對於經濟權以及社會權的規定，政體的精神基礎則是憲法所預設的政治文化與價值觀。

當代墨西哥憲法於 1917 年制定並延用至今，憲法本文共 136 條。若以前段 Elazar (1990) 所主張的第一個面向來分析墨西哥憲法，可發現該國憲政體制有兩個重要特徵：

首先是「總統集權」。就法定的權力 (de jure powers) 而言，墨西哥憲法規定總統為三軍統帥，負責掌管國內外重大事務。具體而言，墨西哥憲法第 89 條規定總統有以下權力：一、提出立法議案；二、任命內閣官員，其中包括在黨國體制時期常常被視為僅次於總統職位的內政部長 (*Secretaría de Gobernación*)²；三、任命外交官員以及高階軍事將領；四、在參議院同意的前提下任命檢察總長和最高法院法官。其中，墨西哥內政部的重要性在於掌握全國政黨與選舉事務，同時也掌握情治單位。另外，總統有權任

² 墨西哥的內政部長常常是總統指定接班的人選，從 1928 年到 2000 年的 13 位總統中，就有 8 位曾任內政部長，其中只有 1 位落選 (2000 年總統大選的候選人 Francisco Labastida) (Edmonds-Poli & Shirk, 2009: 77)。

命最高法院法官的重要性在於，其他各級法官皆由最高法院所任命。

其次是「民選官員不得連任」。1911 年獨裁者 Porfilio Díaz³ 被推翻，革命運動的主要口號即為「要有效的投票權，不要連選連任」(*Sufragio efectivo, no reelección*)。1917 年墨西哥憲法第 83 條明文規定總統終身只能擔任一次，任期 6 年；憲法第 116 條規定各州州長（包括首都墨西哥市市長）終身只能擔任一次，任期亦為 6 年。至於國會議員以及其他各層級民選官員，在 2018 年之前⁴，若在卸任後想要再次投入同一層級的選舉，則需要隔一個任期後才能再選，不得在任期結束後立刻投入下一次選舉。

為了深入理解墨西哥憲政體制與政黨政治的關係，本文將採理性選擇制度論與歷史制度論的視角進行分析。首先，理性選擇制度論預設行為者具有理性、且追求利益極大化的特質，並且將「制度」定義成一系列規則與誘因所營造出的政治空間，提供相互依賴的政治行為者在其間進行活動 (Peters, 2012: 48)。換言之，制度所提供的限制與誘因，將會形塑行為者的理性行為 (Shepsle, 1989; 2006)；同時，制度的延續或改變，也是這些行為者重要的鬥爭場域 (North, 1990)。

其次，和理性選擇制度論相同的是，歷史制度論亦主張制度對於政治後果的解釋有其重要性，但歷史制度論更主張特定的制度一旦形成之後，其歷史遺緒 (historical legacies) 會對於相關行為者的行為產生長遠的影響 (Steinmo, et al., 1992)；而更重要的是，制度會隨著時間形成自我再生的機制 (reproduction mechanism) 而持續存在，不會輕易偏離「路徑依賴」(path dependence) 而出現劇烈改變 (Pierson, 2004)，因而呈現一種制度的「黏著性」(stickiness) (Krasner, 1984；轉引自 Thelen and Steinmo, 1992: 15)。除了制度會隨時間自我強化，制度不易改變的另一個原因則和特定的理念 (idea) 深入人心有關 (Hall, 1992)。除非遭逢偶發的「外在衝擊」(exogenous shock)，導致不同政治力劇烈衝突而出現「關鍵時刻」(critical juncture)

³ Díaz 在 1876 年到 1911 年間於墨西哥進行獨裁統治，其名言為：「可憐的墨西哥，離美國如此近，離上帝如此遠！」(Aguilar Méndez, 2006: 57)。

⁴ 墨西哥 2014 年通過修憲案，更改了國會議員不得連任的規定，於 2018 年起實施。

(Collier & Collier, 1991)，或者是不同行為者的政策理念彼此間出現重大衝突 (Peters, et al., 2005)，才有可能讓既有的制度產生鬆動與改變。

本文認為，上述這兩個新制度主義理論頗為適合用來解釋墨西哥憲政體制對於政黨政治發展的影響。首先，墨西哥在二十世紀初所打造的憲政體制，其中關於「總統集權」以及「民選官員不得連任」的兩大規定，確實讓他們得以掌握國家大政並控制黨內菁英的政治前途，進而對於政黨政治的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簡言之，這兩個規定對於歷任總統的政治行為具有形塑的效果，反映了理性選擇制度論的論點。其次，上述兩大憲政規定之所以形成，主要是因為 PRI 在建立黨國體制之後，強調「政治穩定」⁵和「要有效的投票權，不要連選連任」兩大理念，因此特別在憲法中設計「總統集權」以及「民選官員不得連任」的規定。更重要的是，這兩個憲政規定長期以來形成一種路徑依賴，影響墨西哥政黨政治的發展，頗符合歷史制度論的分析觀點。

參、墨西哥的主要政黨

從 1929 年到 2000 年間，墨西哥政治由 PRI 所建立的黨國體制牢牢掌控，而反對黨的力量在 1988 年突然增強，雖然在 1991 年和 1994 年又減弱，但 1997 年開始至今，墨西哥國會出現沒有任何一個政黨能取得過半席次的多黨體系型態。以下分別介紹：革命建制黨、國家行動黨、民主革命黨、墨西哥生態主義綠黨，以及其他小黨。

首先，為了要團結革命後的各方政治勢力，Plutarco Elías Calles⁶ 整合了近 150 個政黨，於 1929 年籌組國家革命黨 (Na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

⁵ PRI 自詡繼承了墨西哥大革命的精神，主要包括：包容 (inclusion)、重分配 (redistribution) 和穩定 (stability) (Edmonds-Poli & Shirk, 2009: 95)。

⁶ Calles 被視為革命建制黨之父。他在 1928 年任期結束後下台後，Álvaro Obregón 於該年勝選，但選後 7 天遭到暗殺身亡。為了解決政治危機，Calles 有效整合許多小黨以成立 PNR，並以 PNR 為基礎主導 Obregón 的繼任者，使墨西哥進入以 Calles 為幕後實質統治者操縱魁儡總統的「大統領時期」(Maximato)。1934 年 Lázaro Cárdenas 當選總統後，Calles 仍想要持續發揮影響力卻未能如願，於 1936 年被迫流亡美國。

PNR) (Álvarez, 2013), 為當代墨西哥政治體系奠定制度化的基礎, 同時也正式讓總統得以行使憲政權力以及「超憲法權」。後來在 Lázaro Cárdenas⁷ 總統的主導下, 1937 年 PNR 的黨代表大會決議重組黨組織, 除了將黨名改為「墨西哥革命黨」(Mexican Revolutionary Party, PRM), 更將黨分成四大部門: 軍人部、農民部、工人部以及群眾部。1946 年 Manuel Ávila Camacho⁸ 總統將 PRM 重組為「革命建制黨」(PRI), 之後延用這個黨名至今。

PRI 的意識型態大致上位於中間, 但常依不同總統在面對不同的經濟情勢時而調整, 時而成為中間偏左、時而偏右 (Cornelius & Craig, 1991)。除了建立黨控制社會的組織框架外, 派系政治則是 PRI 內部運作過程的基礎 (Johnson, 1984: 83)。PRI 內派系為具有多元聯繫的團體, 其主要的基礎有三: 政治家族關係、校友關係、工作同事關係 (Camp, 1990: 96-101)。在過去, 對於有意參政的人而言, 通往權力之路的起點為先加入 PRI, 參與基層黨務運作; 接著加入特定派系, 擔任該派系重要幹部的秘書, 建立個人小派系, 然後透過輔選、競選議員等, 進一步與黨內高層建立人脈網絡 (Cosío Villegas, 1975: 144; 轉引自蘇彥斌, 2005: 51-52)。

墨西哥第二個重要的傳統政黨為國家行動黨 (PAN)。1939 年 9 月, 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 (UNAM) 校長 Manuel Gómez Morín 成立 PAN, 其主要的組成分子為政治傾向較為保守的知識分子、專業人士以及企業家, 其原初的成立目的在於抵制 Cárdenas 總統加速農業改革以及擴大政府管制經濟等左傾政策。此外, PAN 認同天主教會的立場, 並支持教會力量參政, 這點與墨西哥憲法中強調教會不得涉及任何政治事務的精神有違。然而, PAN 在經過了多年的努力後, 1991 年墨西哥通過修憲, 允許神職人員可以投票與批評政府、合法化教會成立的學校、並且允許教會自由使用廣電媒體。

在 PRI 的黨國體制下, PAN 長期以來以「忠誠反對黨」之姿參政

⁷ Cárdenas 在任內除了改組 PNR 為 PRM 之外, 亦大力推動土地改革以及教育改革, 為 PNR-PRM-PRI 統治墨西哥 71 年中最為左傾的總統 (Mainwaring & Scully, 2003: 35)。

⁸ Camacho 總統除了為 PRI 定名之外, 在任內亦對於該黨進行組織改革, 包括裁撤軍人部, 並進一步強化群眾部的組織, 代表的利益包括教師、公務人員等中產階級。

(Eisenstadt, 2004: 162)⁹。然而，PAN 的黨內菁英雖然都認為 PRI 的一黨專政違反民主原則，但對於是否要在一黨專政的結構下參政，有著不同的聲音。這樣的意見衝突因為黨內分權化的結構而持續，一直到 1976 年白熱化，黨內派系的劇烈鬥爭導致無法在該年總統大選推出候選人，甚至差點付出「滅黨」的代價 (Edmonds-Poli & Shirk, 2009: 158)。然而，1980 年代的經濟危機使人民對於 PRI 的執政開始失去信心，而 PAN 也趁勢調整選舉策略，將重心放在地方選舉的經營，逐步取得成功，其累積的能量在 2000 年總統大選得以發揮，順利拿下總統寶座。

民主革命黨 (Party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PRD) 為近代墨西哥史上最最重要的第三大黨，由 Cuauhtémoc Cárdenas¹⁰ 所創立。1986 年 Cuauhtémoc Cárdenas 與其他左傾的黨內菁英成立「民主潮流」(Democratic Current, CD)，公開反對總統 Miguel de la Madrid¹¹ 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政策，同時也主張 PRI 應該要改用民主初選制產生總統候選人。然而，Cuauhtémoc Cárdenas 追求 PRI 黨內改革的主張未被接受，隨後與其他左翼小黨聯合組成一個鬆散的選舉聯盟—全國民陣線 (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 FDN)，在 1988 年的總統大選形成挑戰 PRI 的重要力量。

1988 年選後，FDN 正式註冊為新政黨 PRD，意識型態左傾。就組織而言，與 PRI 和 PAN 相比，PRD 的制度化程度不足，其主要的原因是組成該黨的政治團體在意識型態與政治目標上有很大的差異，因此在決定議題立場和候選人時，常出現極為嚴重的意見分歧，最後仍需由黨主席作定奪。Cuauhtémoc Cárdenas 在 1994 年與 2000 年競選總統失利後，PRD 黨內最重要的後起之秀為 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他在 2006 年總統大選中以

⁹ 除了 PAN 之外，墨西哥黨國體制時期尚有幾個與 PRI 關係密切的附庸政黨，包括 1947 年成立的大眾社會主義黨 (Popular Socialist Party, PPS) 以及 1955 年成立的正統墨西哥革命黨 (Authentic Party of the Mexican Revolution, PARM)。

¹⁰ Cuauhtémoc Cárdenas 為前總統 Lázaro Cárdenas 之子，在 1987 年之前都一直是 PRI 黨內的重要人物。

¹¹ Miguel de la Madrid 總統於 1982 年上任後即致力於推動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但對於提升經濟發展成效不佳，再加上未能妥善處理 1985 年墨西哥市大地震的賑災工作，使 PRI 在 1988 年的總統選舉瀕臨敗選邊緣。

0.58% 的得票率差距敗給 PAN 的 Felipe Calderón¹²，選後立即發動大規模示威，自稱墨西哥的「合法總統」，並率眾占領總統府前廣場達數月之久。López Obrador 在 2012 年再次代表 PRD 競選總統失利，不久後退出 PRD 並在 2014 年成立國家復興運動黨 (National Regeneration Movement, MORENA)，在 2015 年國會選舉表現不俗，為眾議院第 5 大黨。

墨西哥生態主義綠黨 (Ecological Green Party of Mexico, PVEM) 於 1986 年由 Jorge González Torres 成立，從 1997 年開始的每一次國會選舉，皆穩坐第四大黨。然而，PVEM 和一般歐洲各國的綠黨不同的是，PVEM 雖然誓言要解決污染問題，但大多時候只是把重視生態環保的理念當作是吸引選票的包裝，實際上並不是一個偏左的進步政黨。相反的，其意識型態屬右翼，在政策議題上支持死刑以及反墮胎，而且因為第二任 (亦為現任) 的黨主席為創黨主席之子，而被批評為家族性政黨。在選舉的策略上，PVEM 會視情況與不同的大黨結盟，以確保自身的生存 (Spoon & Gómez, 2017: 94)。

其他較具規模的墨西哥小黨還包括工黨 (Labor Party, PT) 以及新聯盟黨 (New Alliance Party, PANAL)。工人黨於 1990 年成立，屬於左派政黨，在屆次大選皆與 PRD 密切合作結盟；PANAL 為 PRI 前秘書長 Elba Esther Gordillo 成立，Gordillo 當時也是全拉丁美洲最大工會—全國教師總工會 (National Educational Workers Syndicate, SNTE) 的領導人 (1989-2013)。PANAL 以爭取教師利益為最重要的政治目標，因此，PANAL 在意識型態的光譜上並沒有很明確的位置，常視情況與不同的大黨結盟 (Wood, 2012: 98)。

肆、墨西哥憲政體制、民主化與政黨政治

在黨國體制時期，墨西哥憲政體制中「總統集權」以及「民選官員不得連任」的特徵，充分發揮穩固 PRI 統治的效果，當時的墨西哥總統甚至被稱為具有「超憲法權」(meta-constitutional) 的制度行為者 (Carpizo, 1977;

¹² Calderón 為 PAN 執政時的第二任總統，其任內歷經死傷達數萬人的「墨西哥毒品戰爭」(Mexican Drug War) 以及 2008 年的全球經濟大衰退。

Garrido, 1989)。根據 Jeffrey Weldon (1997) 的研究，讓墨西哥總統具有絕對支配地位的條件，除了上述兩個憲政體制特徵外，還有三個關鍵條件：PRI 長期掌握行政權與國會多數的全面執政 (unified government)、PRI 議員對黨紀的高度遵守、以及總統為 PRI 實質領導人¹³。

另外，讓 PRI 得以在黨國體制下支配墨西哥政黨政治的另外兩個因素為：「欠缺具獨立性的選務機關」和「國家組合主義」(state corporatism)¹⁴。1940 年起至今，墨西哥開始定期舉行總統與國會選舉；1946 年墨西哥通過聯邦選舉法，將政黨註冊及所有選務工作皆納入內政部的管轄權限，因而使 PRI 得以利用買票、選舉舞弊以及壓迫反對勢力等手段勝選。其次，1946 年 PRI 的黨組織確立將勞工、農民與群眾等部門予以制度化，反映了一種組合主義的精神 (Grayson, 1988)，為的是要把各種利益團體整合進黨國體制的政治決策過程，並且根據這些組織的實力提名國會選舉的候選人 (Wuhs, 2008)。然而，實際上這些組合主義組織幫助墨西哥革命黨在全國各地建立侍從主義式 (clientelist) 的政治動員機器，收編地方精英以加強國家對社會的控制 (González Campean & Lomelí, 2000)。

1968 年墨西哥大學生動員抗議警察暴力以及政府干預大學自主，PRI 政府出動軍警鎮壓，發生了「特拉特洛科大屠殺事件」(Tlatelolco Massacre)，總共造成數百人死傷，一千多人遭逮捕。這個事件可說是墨西哥一黨專政開始鬆動的轉折點。在特拉特洛科大屠殺事件之後，1970 年上台的 Luis Echeverría¹⁵ 總統為了挽救 PRI 的正當性危機，採取了擴大公共支出、土地重分配改革、增稅等改革。然而，這些改革引發國內經濟菁英的不滿，紛

¹³ PRI 有名義上的黨主席，但在黨國體制下，總統才是該黨實質的黨主席，有權在黨內提名各級地方首長選舉的候選人、撤換任何層級的地方首長，甚至享有指定下屆總統候選人的「接班人欽定權」(dedazo)。換言之，PRI 總統有權決定絕大多數黨國體制內菁英的政治前途 (Nacif, 2004)。

¹⁴ 關於“corporatism”的中譯，有學者將之譯為統合主義、社團主義、協調主義、協同主義、組合主義等。本文參照施正鋒 (2017) 的翻譯，將 state corporatism 譯為國家組合主義，亦即在這樣的制度安排下，人民結社其實是國家控制社會的手段。因此，這樣的譯法很適切地表現出墨西哥 PRI 黨國體制的特性。在此感謝一位匿名審查人的提點。

¹⁵ Echeverría 於 1926 年出生，為墨西哥近代史上首位於墨西哥大革命 (1910-20) 後出生的總統，他在上任後為了挽救 PRI 的統治正當性危機，推動若干政治與經濟改革。

紛將資本外移，再加上不當的貨幣政策，墨西哥在 1970 年代中後期出現經濟危機；1976 年總統選舉，由於 PAN 無法推出候選人參選，PRI 的 López Portillo¹⁶ 成為選票上唯一的候選人，因此再一次重創 PRI 政府的政治正當性。為了因應人民的不滿情緒，Portillo 總統在 1977 年推動選制改革，除了放寬新政黨登記的資格外，更在眾議院新增 100 席專門保留給小黨的比例代表制席位。若有小黨在 300 個單一選區未能獲得 60 席，只要該黨能獲得全國 1.5% 的選票，即可按得票比例分配這 100 個席位¹⁷。

1980 年代開始，López Portillo 政府和 de la Madrid 政府相繼採取新自由主義改革，卻仍無法有效處理債務危機，再加上 1985 年墨西哥發生大地震，PRI 政府未能妥善應變，讓 PRI 政府的正當性雪上加霜，導致不少黨內菁英決定出走。最著名的例子，莫過於前總統 Lázaro Cárdenas 之子 Cuauhtémoc Cárdenas 在 1988 年脫黨參選總統。然而，雖然 Cuauhtémoc Cárdenas 獲得了許多社會運動團體的支持，但在 PRI 明目張膽的作票下，仍然敗給了 PRI 候選人 Carlos Salinas¹⁸ (Lehoucq, 2007)。Salinas 上任後，啟動較大幅度的政治改革，其中包括成立較有獨立性的選舉專責機關。

1994 年墨西哥與美國、加拿大簽訂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以反新自由主義作為號召的薩巴

¹⁶ Portillo 在 Echeverría 政府任內擔任財政部長，於 1976 年就任總統後面臨國內債務危機等問題，因而採取一連串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政策。

¹⁷ 現行的墨西哥聯邦眾議院選舉採取的是一種既非德國聯立制、亦非台灣並立制的混合選制，總計 500 席。其中 300 席為單一選區制 (SMD) 所選出，200 席則透過比例代表制 (PR) 進行分配。特別的是，墨西哥選民在選舉聯邦眾議員時，手中只有一張選票，在所屬小選區的候選人裡投給其中一人；至於 PR 制席次的分配，則是由各黨在 SMD 制的表現所決定，個別選民無法直接決定。具體而言，墨西哥全國另分成 5 個大選區 (circunscripción electoral) 平均分配 200 名由 PR 制選出的眾議員。在每個大選區中，個別政黨可提名一份 40 人封閉式比例代表名單，其席次分配的比例，係按照該黨於這個大選區裡所有單一選區的得票總數占該大選區所有單一選區的總得票數之比例而定。換言之，政黨在一個大選區之 SMD 的總得票率，將如實反映這個政黨於該大選區的 PR 席次分配。

¹⁸ Salinas 為美國哈佛大學博士，早期於 de la Madrid 政府擔任要職，1988 年當選總統後除了延續前任政府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之外，並開始推動墨西哥近代史上較大幅度的政治制度改革。

達農民運動（Zapatista Movement）在墨西哥南部崛起，不僅迫使 Ernesto Zedillo¹⁹ 政府在 1996 年與該運動達成原住民權入憲的協議，同時也間接對於其他民主運動產生鼓舞，升高人民對於終結 PRI 一黨專政的要求。

1996 年 Zedillo 政府進一步推動政治制度改革，讓聯邦選舉院（National Electoral Institute, IFE）成為具完全獨立性的國家選舉專責機關。而更令人矚目的是，在 1997 年之後，PRI 對於州長選舉候選人採取了初選制度，相當程度地影響了總統在州長選舉的提名權（Cesar, 2002: 139）。1999 年 Zedillo 更自願放棄指定下屆 PRI 總統候選人的權力，在 PRI 首次採取初選制度（Weldon, 2002: 383）。過於激烈的初選過程，讓 PRI 黨內的凝聚力進一步下降。而在反對黨方面，PAN 自從 1986 年贏得 Chihuahua 州長選舉，開始在地方層次的選舉取得愈來愈多的選民支持；PRD 則在 1997 年首次墨西哥市長直選中獲勝，挑戰了 PRI 在選舉中的支配地位。

表 1 顯示墨西哥政黨體系自 1991 年以來的變化。1991 年與 1994 年選舉，PRI 尚能在眾議院掌握六成的席次。然而，1997 年國會選舉過後，PRI 首次未能在眾議院取得過半席次，墨西哥已呈現多黨制的態勢；2000 年 PAN 首次擊敗 PRI 贏得總統大選，墨西哥出現史上第一次政黨輪替，國會多黨體系成為常態。圖 1 顯示墨西哥眾議院政黨體系自 1991 年以來的變化，若以「政黨有效數」（effective number of parties, ENP）（Laakso and Taagepera, 1979）的公式來計算的話²⁰，則可見從 2003 年起，墨西哥眾議員維持穩定的「三黨鼎立」態勢。2012 年墨西哥經歷第二次政黨輪替，PRI 重返執政權，但其國會席次從 2009 年的 237 席減至 213 席。在 2015 年國會選舉後，墨西哥政黨有效數約為 4，為史上最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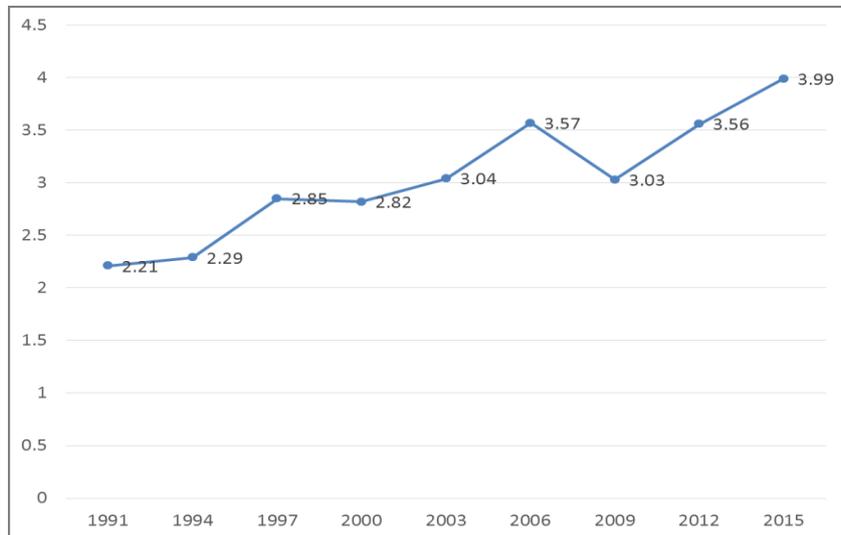
¹⁹ Zedillo 為 PRI 在墨西哥連續執政 71 年時期的最後一任總統，在 1988 年（36 歲）擔任 Salinas 政府要職。Zedillo 在其任內推動具實質意義的民主制度改革，卸任後在許多國際組織擔任經濟顧問，現為美國耶魯大學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²⁰ 其計算方式為：1 除以「各政黨席次率平方後的加總」，其結果可被解讀為「國會裡大小相當政黨之數目」。舉例而言，若一個國家的國會有 100 席，共有四個政黨，每個黨的席次分別為 15 席、20 席、25 席與 40 席，則該國國會的政黨有效數為： $1/(0.0225+0.04+0.0625+0.16)=3.51$ 。

表 1：墨西哥歷屆眾議院選舉各政黨取得的席次變化 (1991-2015)

	1991	1994	1997	2000	2003	2006	2009	2012	2015
國家行動黨 (PAN)	89	119	122	207	149	206	143	114	109
革命建制黨 (PRI)	320	300	239	206	224	104	237	213	208
民主革命黨 (PRD)	41	71	125	53	97	126	71	102	60
工黨 (PT)	-	10	6	8	6	16	13	15	-
墨西哥生態主義綠黨 (PVEM)	-	-	8	16	17	19	21	28	42
人民社會主義黨 (PPS)	12	-	-	-	-	-	-	-	-
正統墨西哥革命黨 (PARM)	15	-	-	-	-	-	-	-	-
國家重建卡德納主義陣線黨 (PFCRN)	23	-	-	-	-	-	-	-	-
民主聚合黨 (CD)	-	-	-	-	5	16	6	18	24
新聯盟黨 (PANAL)	-	-	-	-	-	9	9	10	11
社會民主與農民選擇黨 (PASC)	-	-	-	-	-	4	-	-	-
國家復興運動黨 (MORENA)	-	-	-	-	-	-	-	-	36
社會接觸黨 (PES)	-	-	-	-	-	-	-	-	9
無黨籍議員	-	-	-	10	2	-	-	-	1

資料來源：1988 年和 1991 年的選舉結果資料參考自 Centro de Estudios Sociales y de Opinión Pública (2006)，其餘資料則參考自 Presidencia de la República (2017)。



說明：政黨有效數的計算方式為 1 除以「各政黨席次率平方後的加總」(Laakso & Taagepera 1979)。
資料來源：1988 年和 1991 年資料參考自 Centro de Estudios Sociales y de Opinión Pública (2006)，其餘資料則參考自 Presidencia de la República (2017)。

圖 1：墨西哥歷屆眾議院席次的政黨有效數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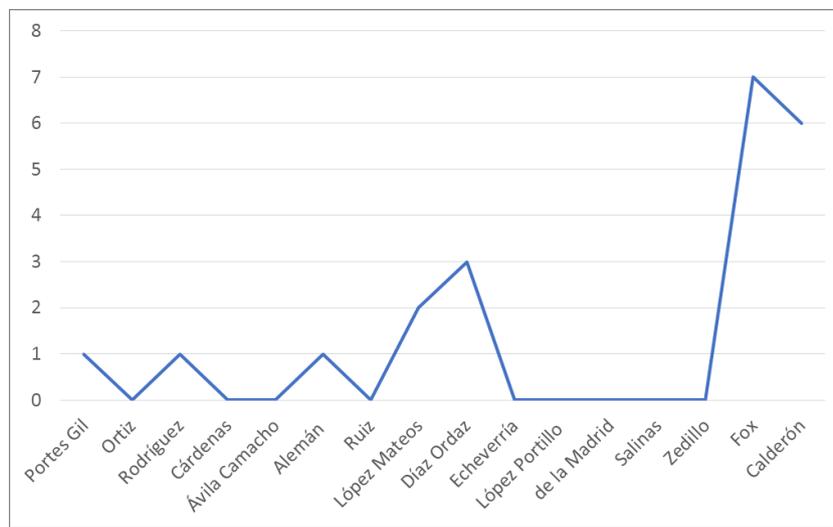
墨西哥憲政體制裡總統集權的規定，對於進入民主鞏固時期的政黨政治造成什麼影響？首先，在國會呈現多黨體系的態勢下，總統在推動政務時若不選擇協商與讓步，則往往面對嚴重的行政－立法衝突。舉例而言，Zedillo 總統在 1997 年面對執政黨未能掌握國會過半席次的情況下，被迫要與反對黨進行協商，例如 1997、1998 以及 1999 年的政府總預算案（Cesar, 1999）。2014 年 PRI 政府為了獲得反對黨對其能財政改革與能源政策改革的支持，Enrique Peña-Nieto 總統同意 PRD 的要求，免除對於食物與藥品的增值稅，並且將最高的所得稅率從 30% 調升至 35%（Starr, 2014: 55; Valverde, 2016）。

1998 年墨西哥出現近代有史以來第一次國會有效制衡總統的事件。當時，墨西哥總統提案建立「銀行儲蓄保護基金」（FOBAPROA），卻未獲國會通過，而國會卻通過了 PAN 版本的法案（Edmonds-Poli & Shirk, 2009: 126）。最近一次政府提案受挫的例子，則發生在 2014 年年底，執政的 PRI 政府欲建造連結首都到 Querétaro 州的高速鐵路，由於宣佈的時間距離投標的時間只有兩個月，導致原先有興趣投標的跨國公司紛紛退出，最後由中國鐵建公司（China Railway Construction Corporation）與若干墨西哥本土公司的聯合集團得標。然而，在得標後，PAN 的參議員認為競標程序有重大瑕疵，指控政府事先將相關投標資訊洩露給中國鐵建，才導致其他競爭者退出。媒體不久還發現第一夫人 Angélica Rivera 向承包商 Grupo Higa 購買豪宅，而 Grupo Higa 則是上述聯合集團的其中一家公司（Martínez, 2014）。為了平息諸多爭議，Peña-Nieto 總統被迫與中國鐵建解除了 37 億 5 千萬的合約²¹。

在探討行政權與立法權互動關係時，總統對於國會立法行使否決權的頻率是一個重要的指標。墨西哥憲法第 72 條規定，總統有權部分否決或全部否決國會所通過的法案。如圖 2 所示，在 PRI（包含其前身 PNR 與 PRM）總計十四任總統的專政統治下（1928-2000），總統對國會立法行使否決權

²¹ 2015 年初在重啟競標程序後，又還是由中國鐵建的聯合集團得標。然而，墨西哥政府因為預算不足的關係，再次取消合約，同時將賠償中國鐵建 131 萬美元（Zhong, 2015）。

總共才 8 次，其中從 1970 年到 2000 年這三十年間，更是完全沒有總統行使否決權的紀錄。相較而言，2000 年墨西哥出現首次政黨輪替，Fox 總統 (2000-2006) 否決國會立法議案的次數高達 7 次，而下一屆的 Calderón 總統 (2006-2012)，則對於國會法案行使過 6 次否決權。



資料來源：Gamboa 與 Valdés (2011)，以及 Aguilar (2016)。

圖 2：屆任墨西哥總統對於國會立法行使否決權的頻率 (1928-2012)

在 Fox 總統任內，行政－立法衝突的情況非常嚴重，甚至一度導致憲政危機。在第 58 屆 (2000-2003) 眾議院任期時，Fox 提案的成功率 (總統法案獲通過數除以總統提案數) 尚有 82%，但到了第 59 屆眾議院 (2003-2006) 任期時，Fox 提案的成功率降至 53%，為有史以來最低，可見當時府會關係非常緊張 (Lehoucq, et al., 2008: 311)。2004 年年底，國會通過預算案，其中削減許多政府當初提議的預算，影響許多部會的運作。Fox 對這個預算案行使否決權，然而，被退回的預算案在反對黨的聯手下，再一次於眾議院推翻總統的否決權，同時也主張根據憲法，認為總統無權否決國會所通過的預算案。對此，Fox 向最高法院提出釋憲。釋憲結果在 2015 年 5 月出爐，最高法院以 6 比 5 的票數支持總統有權否決國會的預算案，同時宣告國會推翻總統否決權的決定失效，要求國會對於總統否決的那些

預算案內容進行重新討論 (de la Garza, 2013: 92)。

另外，墨西哥憲政體制裡關於民選內員不得連任的規定，對於進入民主鞏固時期的政黨政治造成什麼影響？事實上，這個憲政規定在政黨輪替前後皆阻礙了民主代議政治的運作。質言之，這個規定的存在，使得幾乎所有民選官員剛選上不久，就得積極思考卸任後的規劃，也因此促發了三種政治後果：一、大多數民選官員為了在政壇生存與晉升，極為重視與黨內領導階層（特別是總統）的互動，反而不在意與選民的連結；二、由於議員的任期只有一任，因此不論是國會或是地方議會，議員本人及其助理人員的專業化程度普遍不足；三、減少制定長期政策的誘因 (Álvarez, 2013: 299)。這些政治後果雖然在 1997 年以前的 PRI 一黨專政時期也同樣存在，但在 2000 年進入民主鞏固時期，這些後果則會對於政治代表的品質與政治課責造成負面影響，不利於進一步的民主深化。

值得一提的是，民選官員不得連選連任的規定，從 1920 年代一直到最近，都一直是各政黨角力的場域。1917 年憲法明文規定總統不得連選連任，但是在 1927 年，Calles 總統以及國會裡支持前總統 Álvaro Obregón (1920-24) 的國會議員，合力通過修憲允許總統可以連選連任。然而，1933 年國會再次通過修憲，將「禁止連選連任」的規定再度入憲 (Colomer, 2001: 155)。此後，民選官員禁止連選連任的規定實行了逾八十年。2014 年 Peña-Nieto 總統為了要換取 PAN 對其能財政改革與能源政策改革的支持，同意 PAN 的要求，透過修憲改變國會議員不得連選連任的規定：自 2018 年起，聯邦眾議員可以連選連任，最多可達 4 任 (12 年)，而聯邦參議員亦可連選連任，最多可達 2 任 (12 年) (Starr, 2014: 55; Valverde, 2016)。

伍、結論

本研究從理性選擇制度論與歷史制度論的角度出發，認為墨西哥憲政體制中的「總統集權」以及「民選官員不得連任」兩大特色，不僅形塑了歷屆總統的權力行為，同時也因為革命結束後各方政治行為者強調「政治穩定」和「要有效的投票權，不要連選連任」兩大理念，形成一種路徑依

賴，因而對於該國政黨政治發展造成影響。具體而言，從理性選擇制度論的角度來看，墨西哥總統在 2000 年政黨輪替之前，皆充分利用這兩個憲政體制的特色鞏固由 PRI 所主導的一黨專政體制。由於總統集權，使總統得以充分運用行政資源幫助 PRI 在各層級選舉中勝選，進而壓迫反對黨的生存空間；而由於民選官員不得連任，使總統得以透過提名黨內各級選舉候選人以鞏固自身權力，在府會關係中成為主導者。另外，若從歷史制度論的角度來看，上節討論所呈現在政黨輪替前具有較少的有效政黨數，以及幾乎沒有衝突可言的府會關係，則反映墨西哥憲政體制中的「總統集權」以及「民選官員不得連任」兩大規定具有路徑依賴的特性。

然而，這兩大憲政體制特色的影響在民主化之後對於政黨政治的發展出現了變化。從理性選擇制度論的角度來看，PAN 在執政後，其黨籍總統仍享有總統集權的制度優勢，但因為面臨朝小野大的局面，府會關係又缺乏促進合作的誘因 (Álvarez, 2013)，導致在 PAN 執政時期造成了劇烈的行政-立法衝突，對於進一步的民主深化可能會有所阻礙。而從歷史制度論的角度來看，總統集權的憲政制度特色並未改變，仍然呈現高度的制度黏著性，而「民選官員不得連任」的規定雖然因為 PRI 重新執政後與反對黨妥協而有所放寬，但權力最大的兩個職位——總統與州長——則仍然不得連任，反映歷史制度論關於路徑依賴的主張有一定的解釋力。

墨西哥的憲政體制與政黨政治的發展，對於台灣有若干啟示作用。雖然總統制與多黨體系的組合，可能會導致民主體制的不穩定 (Mainwaring, 1993)，但總統制畢竟有權責分明的特色，選民能夠很清楚地依照總統的表現進行民主課責。另外，雖然墨西哥在政黨輪替後的府會關係常常出現緊張，但多數時候仍有所克制，並沒有時常出現憲政層次的危機。相對比之下，台灣的半總統制 (semi-presidentialism) 在運作時往往有「總統有權無責、閣揆無權有責」的問題，而且在民進黨於中央執政時期，國民黨陣營主張依據法國半總統制的自動換軌 (alternation) 原則，要求陳水扁總統交出組閣權以實行「藍綠共治」，然而，這顯示了國民黨不論總統大選結果為何，就是要憑借其國會優勢組閣，其心固然可議，但也正好突顯台灣憲政體制的疏漏之處 (施正鋒, 2010)。因此，為了要讓行政權的權責相符，或

許採取總統制不失為一個有意義的思考方向。

其次，墨西哥與台灣雖然都是新興民主國家，而且很巧合地在 2000 年完成近代史上首次政黨輪替，然而，當代的墨西哥社會並沒有國家認同的問題，所以政黨間的爭鋒相對主要是圍繞在左右的意識型態之爭；相較之下，由於台灣尚未擺脫中華民國外來體制的束縛，國族認同的分歧往往凌駕其他重大政策議題的辯論（例如社會政策和原住民族轉型正義），也因此，台灣人民目前仍然只能讓國族認同主張不同、但意識型態皆偏右的政黨輪流執政。誠然，這或是是台灣在追求國家的締造（state-making）和民族的塑造（nation-building）過程中必經之痛，但總體而言，墨西哥政黨政治發展給台灣的一個啟示，或許就是「雖然獨立不能保證民主，獨立卻是民主的必要條件」（施正鋒，2015：19）。簡言之，為了讓台灣民主進一步深化、讓社會多元價值得以展現以及相互競爭，有必要儘快完成國家正常化以及妥善處理族群對立的目標。

參考文獻

- 施正鋒，2015。〈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現況、以及挑戰〉《台灣國際研究季刊》11 卷 4 期，頁 1-32。
- 施正鋒，2017。〈公務人員的罷工權〉《民報》(<http://www.peoplenews.tw/news/f69d4344-6ec9-4cfa-be45-e1c4fbef9580>) (2018/3/3)。
- 施正鋒，2010。〈十年來半總統制在台灣的運作〉發表於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主辦「半總統制與民主學術研討會」。台北，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際會議廳，6 月 5 日。
- 蘇彥斌，2005。《墨西哥的社會運動與民主化》。台北：台灣國際研究學會。
- Aguilar, Karina. 2016. "Los Vetos De Los Presidentes." *24 Horas* (<http://www.24-horas.mx/los-vetos-de-los-presidentes/>) (2017/10/15).
- Aguilar Méndez, Sergio, José Luis Benítez Lugo, and Rolando Tafolla Macklen. 2006. *Problemas Sociales, Económicos y Políticos de México*. Mexico, D.F.: 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
- Álvarez, Jorge Arturo. 2013. "Why Has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Led the Mexican Presidential System to Political Instability? A Proposal to Enhanc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Mexican Law Review*, Vol. 5, No. 2, pp. 277-304.
- Camp, Roderic A. 1990. "Camarillas in Mexican Politics: The Case of the Salinas Cabinet." *Mexican Studies/Estudios Mexicanos*, Vol. 6, No. 1, pp. 85-107.
- Carpizo, Jorge. 1977. *El Presidencialismo En México*. México, D.F.: Siglo XXI.
- Centeno, Miguel Angel. 1999. *Democracy within Reason: Technocratic Revolution in Mexico*.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Centro de Estudios Sociales y de Opinión Pública. 2006. "Temas De Política Interior." (http://archivos.diputados.gob.mx/Centros_Estudio/Cesop/Comisiones/4_pinterior.htm) (2017/10/05).
- Cesar, Ma. Amparo. 1999. "Las Relaciones Entre El Poder Ejecutivo Y El Legislativo: El Caso De México." *Política y Gobierno*, Vol. 6, No. 1, pp. 83-128.
- Cesar, Ma. Amparo. 2002. "Executive-Legislative Relations: The Case of Mexico (1946-97)," in Scott Morgenstern, ed. *Legislative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pp. 114-4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and, Virkham K. 2001. *Mexico's Political Awakening*. Notre Dame: University Press of Notre Dame.

- Cheng, Tun-Jen. 2008. "Embracing Defeat: The Kmt and the Pri after 2000," in Edward Friedman, and Joseph Wong, eds. *Political Transitions in Dominant Party Systems: Learning to Lose*, pp. 127-47. New York: Routledge.
- Collier, Ruth B., and David Collier. 1991. *Shaping the Political Arena: Critical Junctures, the Labor Movement, and Regime Dynamics in Latin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Colomer, Josep M. 2001. *Political Institutions: Democracy and Social Cho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ornelius, Wayne, and Ann Craig. 1991. *The Mexican Political System in Transition: The End of an Era*. La Jolla: Center for U.S.-Mexican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Cosío Villegas, Daniel. 1975. *La Sucesión Presidencial*. México, D.F.: Editorial Joaquín Mortíz.
- de la Garza, Jose Maria Serna. 2013. *The Constitution of Mexico: A Contextual Analysis*. Oxford: Hart Publishing.
- Domínguez, Jorge I. 1999. "The Transformation of Mexico's Electoral and Party Systems, 1988-97: An Introduction," in Jorge I. Domínguez, ed. *Toward Mexico's Democratization: Parties, Campaigns, Elections and Public Opinion*, pp. 1-23. London: Routledge.
- Edmonds-Poli, Emily, and David A. Shirk. 2009. *Contemporary Mexican Politic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Eisenstadt, Todd A. 2004. *Courting Democracy in Mexico: Party Strategies and Electoral Institu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lazar, Daniel J. 1990. "Constitutional-Making: The Pre-Eminently Political Act," in Daniel J. Elazar, ed. *Constitutionalism: The Israeli and American Experiences*, pp. 3-29. Lanham, Md.: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 Gamboa, Claudia, and Sandra Valdés. 2011. "Análisis De La Figura Del Veto." *Subdirección de Análisis de Política Interior, Cámara de Diputados LXI Legislatura* (<http://www.diputados.gob.mx/sedia/sia/spi/SAPI-ISS-14-11.pdf>) (2017/10/12).
- Garrido, Luis Javier. 1989. "The Crisis of Presidentialismo," in Wayne A. Cornelius, Judith Gentleman, and Peter H. Smith, eds. *Mexico's Alternative Political Futures*, pp. 417-434. La Jolla: Center for U.S.- Mexican Studies.
- González Campeán, Miguel, and Leonardo Lomelí, eds. 2000. *El Partido De La Revolución: Institución Y Conflicto (1928-1999)*. Mexico, D.F.: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 Grayson, George W. 1988. *Mexico: From Corporatism to Pluralism?* Fort Worth, Tex.: Harcourt Brace & Co.
- Hall, Peter A. 1992. "The Movement from Keynesianism to Monetarism: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British Economic Policy in the 1970s," in Sven Steinmo, Kathleen Thelen, and Frank Longstreth, eds. *Structuring Politic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pp. 90-11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untington, Samuel P.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 Johnson, Kenneth F. 1984. *Mexican Democracy: A Critical View*. New York: Praeger.
- Krasner, Stephen. 1984. "Approaches to the State: Alternative Conceptions and Historical Dynam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16, No. 2, pp. 223-46.
- Laakso, Markku, and Rein Taagepera. 1979. "Effective Number of Parties: A Measure with Application to West Europ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12, No. 1, pp. 3-27.
- Lehoucq, Fabrice. 2007. "¿Qué Es El Fraude Electoral? Su Naturaleza, Sus Causas Y Consecuencias." *Revista Mexicana de Sociología*, Vol. 69, No. 1, pp. 1-38.
- Lehoucq, Fabrice, Gabriel Negretto, Francisco Aparicio, Benito Nacif, and Allyson Benton. 2008. "Policymaking in Mexico under One-Party Hegemony and Divided Government," in Ernesto Stein and Mariano Tommasi, eds. *Policymaking in Latin America: How Politics Shapes Policies*, pp. 287-328. New York: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 Mainwaring, Scott. 1993. "Presidentialism, Multipartism, and Democracy: The Difficult Combinat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26, No. 2, pp. 198-228.
- Mainwaring, Scott, and Timothy R. Scully. 2003. "The Diversity of Christian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in Scott Mainwaring and Timothy R. Scully, eds. *Christian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Electoral Competition and Regime Conflict*, pp. 30-6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rtínez, Jan. 2014. "La Casa De La Esposa De Peña Nieto Desata Una Polémica En México." *El País* (https://elpais.com/internacional/2014/11/10/actualidad/1415637362_407817.html) (2017/10/06).
- Nacif, Benito. 2004. "Las Relaciones Entre Los Poderes Ejecutivo Y Legislativo Tras El Fin Del Presidencialismo En México." *Política y Gobierno*, Vol. 11, No. 1, pp.

9-41.

- North, Douglass C.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Peters, B. Guy. 2012. *Institutional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 Continuum.
- Peters, B. Guy, Jon Pierre, and Desmond S. King. 2005. "The Politics of Path Dependency: Political Conflict in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7, No. 4, pp. 1275-1300.
- Pierson, Paul. 2004. *Politics in Time: History,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Analysi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Presidencia de la República. 2017. "Quinto Informe De Gobierno." (http://framework-gb.cdn.gob.mx/quintoinforme/5IG_ANEXO_FINAL_TGM_250818.pdf) (2017/10/05).
- Sartori, Giovanni. 1976.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chatz, Sara. 2000. *Elites, Masses, and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Mexico: A Culturalist Approach*. Westport, Conn.: Praeger.
- Shepsle, Kenneth A. 1989. "Studying Institutions: Some Lessons from the Rational Choice Approach."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Vol. 1, No. 2, pp. 131-47.
- Shepsle, Kenneth A. 2006. "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 in R. A. W. Rhodes, Sarah A. Binder, and Bert A. Rockman,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pp. 23-3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Martin J. 2009. *Power and the State*.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 Spoon, Jae-Jae, and Amalia Pulido Gómez. 2017. "Unusual Bedfellows? Pri-Pvem Electoral Alliances in Mexican Legislative Elections." *Journal of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Vol. 9, No. 2, pp. 63-92.
- Starr, Pamela K. 2014. "Mexico's Problematic Reforms." *Current History*, Vol. 113, No. 760, pp. 51-56.
- Steinmo, Sven, Kathleen A. Thelen, and Frank Longstreth, eds. 1992. *Structuring Politic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helen, Kathleen, and Sven Steinmo. 1992.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Sven Steinmo, Kathleen Thelen, and Frank Longstreth, eds. *Structuring Politics: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pp. 1-3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revizo, Dolores. 2011. *Rural Protest and the Making of Democracy in Mexico*,

- 1968-2000.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Valverde, Miguel A. 2016. "The Craftsmanship of Politics: Negotiating the 2014 Political-Electoral Reform in Mexico." *Journal of Public Governance and Policy: Latin American Review*, Vol. 1, No. 3, pp. 135-56.
- Weldon, Jeffrey A. 1997. "Political Sources of Presidentialismo in Mexico," in Scott Mainwaring and Matthew S. Shugart, eds. *Presidentialism and Democracy in Latin America*, pp. 225-58.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eldon, Jeffrey A. 2002. "The Legal and Partisan Framework of the Legislative Delegation of the Budget in Mexico," in Scott Morgenstern, ed. *Legislative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pp. 377-41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Wood, Duncan. 2012. "Mexico's Democratic Challenges."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5, No. 4, pp. 93-104.
- Wuhs, Steven T. 2008. *Savage Democracy: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Party Development in Mexico*.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Zhong, Nan. 2015. "Rail Firm to Get \$1.31m Compensation from Mexico." *China Daily* (http://www.chinadaily.com.cn/bizchina/2015-05/23/content_20798096.htm) (2016/10/6).

Analyzing the Impact of Mexico's Constitutional System on its Party Poli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w Institutionalism

Yen-Pin S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bstract

This article uses a new institutionalist perspective to analyze how Mexico's constitutional system influences the country's party politics. Specifically, it argues that the centralization of power in the presidency and the prohibition of reelection of elected officials are two crucial features in Mexico's constitution that have important influences on party system development, the law-making process, and executive-legislative relations. Before the party turnover in 2000, these two constitutional features helped strengthen the party-state of the Institu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 (PRI). However, since 2000 the two constitutional features have worsened executive-legislative relations under divided government, which in turn has reduced the quality of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and political accountability.

Keywords: Mexico, constitutional system, party politics

